

## 大明启示录：一个明朝遗民的精神穿越 (未发表过，引用者请注明出处，作者保留法律权利)

■ 李扬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副教授）

在躲过了明清易代之“天崩地解”（我朝遗民黄宗羲语）之后，我已剃发易服，大明衣冠早已藏进了十三陵的地宫中。然而，我要说，你们误读了我朝。比如，我朝当时就是叫“大明”，不是后来你们才把我朝叫“大明”的。嘉靖二十八年（1549）非法进入我朝而被俘虏的葡萄牙人伯来拉就打听到这样的信息：整个国家叫做大明（Tamenb），居民叫做大明人（Tamenjins），因此在本国没有听说他们名叫 China 或 Chins。我朝如同历朝一样，皆以朝代名代替国名，是以在长达数千年历史中，中国并没有恒定万世的国名也。因此，在本质上而言，中国更多的是一个自在自为的文化实体。所以，跟你们同时代的一个美国人白鲁恂（Lucian W. Pye）甚至尖锐的指出：“中国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如此甚合中国历史，然则，我朝之后数百年，国人似乎并未认真看待这个问题，而认真看待这个问题，极为有助于你们引领所处的时代。

### 被误读的顾亭林

又比如，你们误读了我朝遗民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微言大义，将“天下”偷换为“国家”，而标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亭林先生的原意是：“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因此，匹夫真正的责任是关注文化本体的兴亡，而非“国家”的兴替。王朝的兴替不是最重要的，对于“匹夫”而言，中国文化的血脉存续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是明清易代时期即已产生的隐忧，500年来还是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此即所谓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是也。

我朝亡后约 180 年，那个呼唤“我劝天公重抖擞”的诗人放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命题的另一面，则是欲立其国，必先立其史。你们的时代已经走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欲了解世界，必先了解中国。而了解中国又必须置中国于世界背景之中。

然而，对“客观历史”的描述只能是一种对历史的解释以及围绕这种解释进行的话语权的争夺。是故，我朝亡后 258 年，深谙此道的梁启超就极为耸人听闻地宣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大师将顾亭林之意弱化为民族主义，甚为坦诚。在本质上而言，那位身为阿拉伯血统的基督徒萨义德（Edward W. Said）认为：“所有的关于历史的再现都是某种错误的再现。”事实上，中国的历史叙述自晚清以后即脱离乾嘉考据轨道，一切为救亡图存服务。当这个使命完成的时候，整个近世历史的叙述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必为中国的新的世界地位和世界目标服务，也就是回归我朝顾炎武的命题。

### 被“偷窃”的大明历史

我朝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往往被忽视了，因为整个世界历史都曾经被东方主义叙事者“偷窃”了。而深受其害的并不仅仅是西方人。

东方主义或欧洲中心论根据欧洲经验将人类历史进行了武断的划分，并预设了欧洲价值的普遍性，使得世界史能够朝向那个方向前进。比如，预设我朝后期必然走向欧洲已经出现的某某主义。杰克·古迪（Jack Goody）认为，事实上，欧洲“偷窃”了非欧洲的价值、制度和技术。他认为，“偷窃历史”这个标题是指历史被西方接管，也就是说，历史被概念化，并以发生在偏狭的欧洲范围，通常是西欧范围内的事件加以呈现，继而，这种模式又被强加到世界其他地区。欧洲大陆一直认为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极具价值的制度，诸如民主主义、重商主义、自由和个人主义，但这些制度在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中也都能找到。“历史的盗窃”不仅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上，还体现在历史分期的独断上。

杰克·古迪认为，西方设定了一种优势（自19世纪以来这种优势明显体现在某些领域），并在时间上将这种优势提前，创造了一种目的论的历史。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是，这些观念被用来证明看待“他者”方式是合理的，因为“他者”往往被看做是静止的，没有外界的推动就不能改变自身。

有很多人在重新审视我朝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即非常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在《白银资本》中，他认为“历史的连续性远比任何不连续性重要得多。所谓这种重大的新起点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不连续的断裂的观念主要是由一种欧洲中心视角造成的。”弗兰克反对认为1500年左右世界历史发生了断裂的说法。他指出：“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所谓以1500年为界的前后之间的断裂”，“与所谓的短裂或新开端相比，贯通1500年前后的连续性无论在实际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更为重要得多。”

作为大明遗民，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不能以后来你们看到的结果来推断历史进行时的我们在想些什么。我们这些人在导致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并不预知所有的关键事件综合起来会发生何种历史后果，换言之，屯门之战（1521）、隆庆开海（1567）、利玛窦东来（1582）、郑芝龙及郑成功等郑氏集团的行动（约1625-1683）、中英首次交战（1637）、满清入关（1644）等等所有重要事件就其参与者而言，是不可能预知他们的行为与其他行为和事件之间产生关系后会有一种必然的目标。如果我们假定所有这些事件都必然有一个目标，那么就是历史决定论——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给历史算卦的主观历史观。

### 似是而非的“闭关锁国”和西方的被边缘化

我朝之历史被“偷窃”之后的一个结论就是：（郑和之后）“闭关锁国”的明朝是中国走向落后的根本原因。然则，此论的本质是欧洲中心论。其理论假设是：正是因为欧洲对中国的打击，才体现出中国是“闭关锁国”的；如果不是“闭关锁国”，中国在后来的中西关系中就不会“落后挨打”。

然而，欧洲走向近代和现代并未向任何外来文明采取一种统一的开放、学习的政策。欧洲国家走向近代和现代史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并无谁进行了统一的总体设计。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历史创造者们也并不知道必然导致领先于中国的历史后果。要我大明朝人预测19世纪后期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形态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荒谬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移情”思考。事实的根本点在于，**欧洲被清末以来的中国人想象成一个均质的政治实体，因此具有采取统一设计未来现代社会的政策。这正是问题的要害。**欧洲并不同中国一样，具有统一的国家形态，甚至也并不具有统一的对外力量。欧洲走向近现代的根源在于其内部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这是中国不具备的最重要的动因。将后来的落后挨打归结为“闭关锁国”这种政策，不仅没有看到欧洲历史的内在逻辑，也没有找到中国落后挨打的结构原因，认为靠一种对外政策就可以解决中国走向现代的问题，是一种片面的思维模式。它恰恰会导致中国片面的追求力量优势而忽视国内变革。

在16世纪及17世纪早期（明末）的东亚，我朝有绝对的优势遂行其道，这就是“明朝的理由”：The Reason of Ming Dynasty，——一种早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国家理由”

(Reason de tat, Reason of state) 的“天下理由”。自我朝中后期开始，欧洲的东来并不是冲击了东方，而是被纳入东方的国际关系体系。因此，就我朝而言，大明以自主和自信之方式与欧洲接触；就欧洲而言，他们也并没有带来具有取代性价值（更遑论普世价值）的世界观，他们的力量也没有达到瓦解东亚既存秩序的程度，这不能说是一种西方冲击的开始。

葡萄牙人在 1500 年以后到达东南亚。此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相继到达东亚中国政治-文化控制区和影响区。他们在穆斯林、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均采取了类似对待美洲印第安人的手段，企图通过掠夺、占领、殖民贸易和强迫改变信仰，将东方卷入一个更大的世界，但这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我所经历的历史的另一个方面是：16 世纪到来的第一波殖民势力同时也遭到我朝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抵抗以及吸纳——这也就是朝贡体制的力量。到底是东方被卷入了世界，还是世界被卷入了东方，当时的行为者谁都不可能有的“世界的”眼光去观察这个过程并预测最终的结果。更重要的一点是，欧洲人也没有带来新的世界观——除了武力和野蛮的殖民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得出结论说是我朝在 16 世纪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就开始被动的卷入世界，相反，应该是我朝建立在普世权力基础上的强烈的普世文明自信心致使中国人将西来的殖民者一一归化进东亚的体系当中：有时是朝贡体制，有时是纯粹贸易体系。

在西欧人与明朝直接交往时，殖民者的惯用手法都仿佛失效了：强大的大明朝迫使西欧人放弃这些做法，他们被定位为“他者”——而不是相反，他们为这个具有悠久历史、辉煌文明和强大力量的国度感到困惑，并且力不从心。中国不是印加帝国——西班牙在征服印加帝国过程中，他们仅仅靠一百多人的远征军即征服了这个帝国，这个历史经验发生在西欧对东方的“殖民”探索的同时期，这无疑给了西欧探险者和商人以极大的错觉和自信。

对印加帝国实行了大屠杀和征服、把印第安人定位为野蛮人的白人，第一次碰到了真正的对手，中国给西欧人带来的力量反击和文化心理震撼是巨大的。以殖民史书写我朝之后的中西交往史不符合历史实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均未能冲击我朝，在一系列烈度军事冲突后，他们被纳入中国的朝贡体制和朝贡贸易范畴，其身份与他们在美洲获得的高贵的白人殖民者身份完全颠倒。这就是作为他者的西欧人的困惑。“东方主义”以一贯的手法表述 1500 年以后的世界历史图景，掩盖了我朝早期接触西欧人时所具有的文化和力量优势，那时，西方人是被边缘化的一群人。

### 海洋明朝：大明的真实地位

我朝并未真正背朝大海。尽管我朝继承了以天下观念为核心的世界观，并且因倭寇问题而对私人出海贸易屡屡施禁，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无论是官方海外贸易（以朝贡贸易的形式）还是私人贸易（以海盗海商的形式）却有积极的发展。就我朝而言，我希望你们应该更多的纪念郑芝龙、郑成功等海商集团，而不是纪念令人匪夷所思的郑和下西洋的舰队，因为前者对我朝中国人的世界观之拓展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这主要表现为我朝后期强大的海商贸易网络和“白银帝国”的世界经济地位。应该辩证的看待我朝之世界观。尽管在朝廷的那些士大夫很多并分不清荷兰人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有什么区别，甚至包括顾炎武在内的大学者都谣传这些“红毛番”或佛郎机人“烹食小儿”，然则，事情的另一面是：与这些欧洲人直接打交道的海商和海盗集团却深知事情的真相。他们在真刀真枪和真金白银中认识了世界。

我朝能够具有这种强制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对海洋的控制力。弗兰克对中国的进步停止于郑和时代的论点，做了最有力的否定的回答。他的分析是建立在广泛阅读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弗兰克有力地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研究专家来说是熟知的，而欧洲学者却不知道。那就是，中国经济在我朝末期并没有停滞，而是很有活力，同时，亚洲贸易体系作为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很活跃。

欧洲人东来和倭寇问题在 16 世纪中期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并以我朝确立优势控制地

位为终结。我朝对沿海的肃清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隆庆元年（1567），我朝政府终于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此一博弈过程的结果是导致“海上明朝”的兴起，从而在事实上否定了认为我朝禁海政策等于闭关锁国政策的论点。

接受招安后的郑芝龙于崇祯六年（1633）10月22日，率明军150艘左右的帆船（其中50艘为特大战船）在金门料罗湾主动出击，打败荷兰武装商船，迫使荷兰签订赔偿条约。荷兰人说：“我们若不肯离开……他们诉诸武力，直到将我们从澎湖岛逐出中国境外为止。”

荷兰殖民者甚至向郑芝龙敬献了“王杖”和“金质王冠”。他们并答应每年向郑芝龙纳贡6-7千英镑。料罗湾一战后，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曾经私下与郑芝龙达成四六开的贸易协议，事实上郑芝龙总揽了该地区的贸易，所谓分成之协议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此后，台湾海峡几成其内湖。郑氏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在与西洋殖民者贸易战中拥有主动地位。研究者认为，“以资本总额来说，在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中国同样出现过拥资达5500英镑到7500英镑的帆船商人，这已经接近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股东勒迈尔8100英镑的数额。”1639年葡人被逐出日本后，我朝商人成为日本海外贸易的主要承担者。

以郑成功（可以包括郑芝龙的早期）为代表的我朝海商集团所具有的世界海洋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是中国传统的统治者及政治家们所无法想象的。郑成功集团的这种海洋意识和积极进取精神，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当时潮流。这是中国明清两代世界意识发展的正途。我朝末年中国人是有可能走出数千年发展轨迹，从而走向海洋，与世界发展同步的。可以说，海商集团们尽管长期被我朝视为海盗，而正是他们才真正代表了中国在16至17世纪应该发展的方向——他们也是大明的子民。

海洋贸易为我朝带来巨大的白银财富。自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的72年间，因海外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按不到一元半即可折银一两算，可折银七八千万两。这是中国学者的估计。日本学者认为更多：仅我朝最后的44年间，至少应有2亿两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然而，海洋明朝也有一个恶劣的后果，由于明朝实行银本位制度，疯狂单方面吸取海外白银，由此虽加强了海上明朝的开放性，但也导致了明朝金融和财政的对外过度依赖，而明朝对此一直放任自流，不去尝试有节制的、寻求控制性的白银外贸和财政政策，最终因财政失败和美洲白银输送中国通道的断绝而极为讽刺性的终结了我朝的中央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朝不是失败于封闭，反而是失败于过度开放！

### **开放的胸襟：大明对去屈辱化历史叙述的精神价值**

就文化而言，法国一位汉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很明显，明末是一个文化沸腾、创新、高度好奇和思想自由的时代。”“我们可以仅限于提及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特点，大家把它视为中国继宋代的伟大‘复兴’之后的第二次‘复兴’。”

历史上少有这样的时期如我朝末期那样有如此众多的士大夫——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为代表——对西方异质文化采取了极为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他们因此成为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

不过，这不是单向的艳羡。16至18世纪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对双方的世界观均产生重大影响。许理和（Erik Zürcher）认为这是“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徐光启说听了利玛窦的高论后，“略借之语，窃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矣。”在二人合译的《几何原本》内，利玛窦和徐光启身穿儒袍，手摇折扇，谈天论地，栩栩如生。使人想起拉斐尔于1509-1511年在名画《雅典学院》中所绘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后世晚清以来中国面临走向世界的第二次契机，与我朝末期相比，大明衣冠的失去同时也伴随中国传统文化泱泱之风的式微。要是晚清以来的中国士大夫有我朝雪浪大和尚（与利玛窦辩论的高僧，他在辩论中对西洋文明报以“傲慢的咧嘴一笑”）那样的自信和气度，中

国也不至于倍感屈辱。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或者说从世界史的角度而言，清帝国的出现是中国历史的悲剧。它不该在中国最有可能和世界同步发展的时候出现，因其回归传统帝国霸权的努力，致使中国名义上得到了康乾盛世，却丢失了千年机遇。清朝的建立使中国成为世界秩序构建的旁观者。因为同时期中国如果继续明末的发展趋势，将参与世界格局的建构。

广义上的全球化即是我朝末期开始的。只有从世界历史和世界范围的时空维度去理解当今中国面临的历史召唤，才能确立树立正常大国心态的原点。这么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朝在与世界的接触中没有留下民族集体的心理创伤。21 世纪初中国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即是其在世界上重新定位自己的大国身份。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和中国“崛起”的精神召唤下，中国人在审视历史包袱时面临“去屈辱化”和确立正常大国心态的任务。由此必然需要拓展历史的视野，走近我朝。